

文史哲研究丛刊



昭德晁氏家族研究

何新所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史哲研究丛刊



昭德晁氏家族研究

何新所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昭德晁氏家族研究/何新所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8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7-5325-4436-2

I. 昭... II. 何... III. 家族—研究—山东省—两宋时代 IV.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3598 号

责任编辑 冯海荣

封面设计 严克勤

文史哲研究丛刊

昭德晁氏家族研究

何新所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5 字数 250,000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25-4436-2

K·869 定价: 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何新所 (1973-), 男, 汉族, 河南省
宜阳县人, 1995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
获学士学位; 199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
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 获文学硕士学位;
200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
专业, 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郑州大学
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及
中国文论。

本书系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项目成果。

责任编辑 冯海荣

封面设计 严克勤

目 录

绪论	1
一、两宋之前的家族状况	1
二、宋代的士人家族	6
三、宋代家族研究综述	12
第一章 昭德晁氏家族考辨	16
第一节 籍贯与迁徙	16
第二节 世系补正	25
第三节 成员考	31
第四节 婚姻考	64
第五节 著述流传考	78
第二章 昭德晁氏家族传统研究	99
第一节 晁氏家族的教育——辞学传统	99
第二节 晁氏家族的家学——佛学传统	109
第三节 晁氏家族的风徽——中原文献之家	118
第三章 昭德晁氏家族学术思想研究	130
第一节 文元心法——晁迥三教思想研究	130
第二节 晁补之楚辞学研究	140
第三节 学术史、思想史与政治史的互动——晁说之 经学思想研究	160
第四节 晁公武学术史观研究	178

第四章 昭德晁氏家族文学创作研究	194
第一节 晁氏家族文学创作概貌	194
第二节 诗歌创作研究	208
第三节 词之创作研究	240
第四节 散文创作研究	260
结语	275
附录:宋昭德晁氏家族事迹著作编年	281
参考文献	305
后记	318

绪 论

家族研究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特别是对于具有较高文化水平、较高社会地位的门阀士族、世家大族的研究,对于揭示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实质更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大家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态、性质和社会作用。本书以两宋时期著名的文化大家族昭德晁氏为研究对象,试图以微见著,揭示宋代家族的某些特质。

一、两宋之前的家族状况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单位。同一血缘关系家庭构成的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且重要的结构模式。家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基本的文化根源之一。中国古代的传统,家是国的缩影,齐家方能治国。儒家的思想,也是推己及人,以家族的血缘关系为一切伦理道德关系的基础。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的家族文化对于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具有重要的意义。

家族形式、家族文化历经几千年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先秦世族世官宗族制;秦汉至唐五代的士族宗族制;宋、元、明、清科举制下的祠堂族长宗族制;近、现代社会巨变中的宗族制度^①。下面着重论述和宋代家族文化关系密切且形成鲜

^① 常建华:《中华文化通志·制度文化典·宗族志》第一章《宗族制度演变概述》,页18—5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明对照的中古社会之士族家族的文化特色。

中古社会的士族始于东汉的世家大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为门阀士族,唐代是高门士族衰落消融的时期,而唐末五代的动乱彻底荡涤了高门士族文化的存在。东汉光武帝依靠地方豪强势力取得帝位,这些地方豪强家族因而也获得了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同时这些豪强家族有一部分本身也是经学世家。在汉武帝施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以后,读书通经成为仕进的最佳门径。而限于当时物质文化发展的水平,一般人家难以获得学习经书的机会,经学多在一些家族内部传承,形成经学讲家法的传统。因此,当时的经学世家也就在政治上取得了优越的地位。《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云:“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可见当时经学和现实生活之密切关系。豪强大族也顺应时代的要求,从世官向士族化转变。而他们又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这样就出现了累世经学和累世公卿的局面。最有名的是弘农杨氏世传欧阳《尚书》之学。从杨震起,四世皆为三公。汝南袁氏,从袁安起,四世有五人位至三公。东汉尚且是世家大族,是门阀士族形成的萌芽时期。门阀士族的真正形成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在东晋。这时形成门阀士族的社会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其次是时代的动乱、统一帝国的瓦解与分裂、新皇朝对于世家大族势力的依赖使门阀士族获得了发展的大好时机;第三,九品中正制这一选举形式成为世家大族向门阀士族转变的重要推动力^①。门阀士族实际上就是贵族,最讲究的就是阀阅和门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而门阀士族之间也因为形成的早晚而分高低。当时谱学极其兴盛,深究各

^①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页556—64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家门第,区分势族与寒族。唐代柳芳论述当时的门第情况时说:“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说明当时南朝、北朝均十分重视门阀。门阀士族作为当时的贵族阶级,在文化上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垄断了当时的文化教育,同时也形成了各家独具的家学与门风。他们对于文化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贵族精英集团的特点是“盘踞在社会的上层,且享有特权地位的一批人。他们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和相同的象征行为,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基本文化,并带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他们的生活特征。其生活特征包括了特殊的说话腔调、衣着服饰、仪表态度、交友方式,带着排外色彩的集会以及自别于一般平民的精英意识”^①。关于他们的家学与家风,钱穆先生说:“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象,则成为家学。”^②当时,高门士族一方面提倡家族内部的孝友,另一方面强调经学传家。同时,高门士族整体的发展趋势是由武趋文,由官僚趋向文士,尚文的倾向使世家弟子皆如芝兰玉树,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优雅的举止,优美的门风。但是,尚文也使他们逐渐丧失了行政的能力,为门阀士族的衰落埋下了隐患。到了南朝的末期,当时新兴的皇族并非高门士族,而多是出身于寒门或军伍,他们逐渐起用一些寒族,使寒族的实际地位逐渐超过了高门士族。门阀士族制度走向了衰落。

① 梅家玲:《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收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页24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②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收入其《中国学术思想论丛》(三),页171,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再版。

隋唐时期,作为统治者的杨氏家族和李氏家族均承传北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以关中地区为文化正朔所在。李唐为了稳定统治,以关陇士族集团为中心,又吸纳了山东高门郡姓的势力。但是由于隋唐以来选举制度的变化,科举制代替了九品中正制,出仕的权利不再被少数门阀士族所把持,而是收归中央。门阀士族的门品便失去了意义,他们的选官特权和免役特权丧失了。科举制给庶族士人创造了平等入仕的机会。庶族士人在政府品官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形成了一个新兴的进士阶层,对于整个唐代的政治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分析唐代科举制的重要政治意义时说:“盖进士之科虽创于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途径并不必由此。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①。新进进士以诗赋创作才华和放浪不羁的性格成为当时非常引人瞩目的一个阶层。又因为当时的进士考试并不采取弥封制,能否考中进士往往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所以行卷之风盛行一时。行卷者往往要展示自己诗笔、史才和议论,因而进士科考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新兴的进士阶层和旧的高门士族在政治上发生了冲突,引起了党争。关于此点,陈寅恪先生说:“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②唐代牛李党争即因此而起。科举取士成为唐代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动力,也促使了门阀士族的消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页202,三联书店,2001。

② 同上,页261。

亡。唐人非常推崇进士科,进士出身成为当时仕进的最佳途径。当时流传着“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但是高门士族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仍然根深蒂固。特别是山东郡姓高自位置,只在高门间通婚,而当时的社会又认同这一点。唐太宗命高士廉重定士族谱时,山东高门崔氏仍排第一,而皇室反在其后。李世民非常气愤地说:“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楸,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只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犹为第一等?”^①后来又禁止这些高门间自为婚姻,他们却自称为“禁婚家”,以此相标榜,崇尚高门的风气并没有改变。陈寅恪先生指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高门士族的优势越来越小。他们只能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毛汉光先生的研究表明:唐代高门士族中也有许多人以进士科出身从政,而且越往唐代后期,以进士出身者越多,并且那些高门子弟带有进士衔的均可官至三品,而高门子弟不由进士出身者一般只能达到中品官。他认为:“自中唐以降,由于圈内竞争的压力加剧,争取多项有利因素以求仕进,大士族子孙也缘引科举以达其保持地位。”^③

① 《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页2443,中华书局,1975。

②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页116,三联书店,2001。

③ 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收入其《中国中古社会史论》,页364,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唐末五代的动乱对于垂死的高门士族给予了致命的一击。五十年间,更换了五个朝代八姓君主,且又多出身行伍,不知文化为何物,对于高门士族更是视若敝屣。《资治通鉴》卷二六五记载云:“(天祐二年五月乙丑)李振亦言于朱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且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全忠以为然。癸酉,贬独孤损为棣州刺史,裴枢为登州刺史,崔远为莱州刺史。乙亥,贬吏部尚书陆扈为濮州司户,工部尚书王溥为淄州司户。庚辰,贬太子太保致仕赵崇为曹州司户,兵部侍郎王赞为潍州司户。自余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搢绅为之一空。辛巳,再贬裴枢为洺州司户,独孤损为琼州司户,崔远为白州司户。”“六月戊子朔,敕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扈、王溥、赵崇、王赞等,并所在赐自尽。时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所以,后人说五代人全不知礼仪廉耻,门阀谱牒,悉荡毁无孑遗。门阀士族彻底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二、宋代的士人家族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内藤湖南说:“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①他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对于唐、宋社会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宋代经济、政治和前代相比有了较大的不同。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造成土地

^①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册 页10—18,中华书局,1993。

更大程度上的私有化,由此也引起了整个社会流动性的加强。门阀士族不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大小地主阶层。他们不具有和国家的对抗能力,更多的是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他们本身的地位也并不稳固,一般不能长久保持其经济政治的地位。士庶之间的差别大大缩小,士庶之间的地位往往会发生互换。当时出现了“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的新情况。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除了经济基础的变化以外,选举制度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宋代实行科举选官制度。虽然科举制在隋唐已经实行,但隋唐的科举制仍带有贵族的、不规范的色彩,而且取士人数有限,能够从科举进身的士人毕竟只是一小部分。而宋代的科举制一方面实行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人为的因素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取士的人数大大增加,是唐代的十倍以上。而且,通过科举出身几乎成了所有人提高社会地位的必由之路。即使那些通过恩荫进入仕途的人,也往往会再谋求一个进士的名分,以求更好的发展。宋代士庶界限打破,科举几乎面对所有人开放。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只要通过了科举考试,很可能成为社会的上层人物。宋代许多著名的人物出身贫寒便是最好的说明。宋代文化的普及,也为人们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条件。同时,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使人们获得书籍的成本大为降低,使文化不再为部分高门所垄断。国家的几次兴学、民间讲学之风的兴盛、书院的开办、藏书家的大量出现,全面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使宋代社会成为一个“文治彬彬”的“惟有读书高”的社会。作为社会文化载体的士人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宋代士人具有广博的知识,集政治家、学者、文人三位于一体。其次,宋代士人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和淑世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宋代士人普遍的追求。第三,宋代士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与怀疑精神。疑经思潮开启了宋代学术的大门,而“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的宏伟抱负,充分显示了宋代士人的自立精神。我们讨论宋代的家族和家族文化就是建立在上述对于宋代社会文化认识基础之上的。

宋代门阀士族虽然已荡然无存,但家族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单位仍然广泛存在。宋代的家族可以分为世家大族、地方望族、一般家族几个层次^②。宋代的世家和地方望族在社会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可以认为,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些大家族和门阀士族相比,有以下新的特点:宋代大家族不再具有和皇朝对抗的性质,不能像门阀士族那样凌驾于皇权之上,而是对于国家政权处于依赖的地位;士庶分限不再严格,大家族和一般人家之间不存在文化上、婚姻上、礼仪上的巨大差异;大家族不再具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家族的地位并不稳固,不能长久保持其社会地位,不断有新兴的家族起而代之;家族的兴替,主要依靠科举和仕宦上的成功程度,只有持续的科举和仕宦才能保持家族的地位。

宋代的世家是和前代的高门士族最为接近的一个类型。世家的形成除了宗室、后族、军功、前朝遗老几种形态以外,最普遍的是科举起家、仕宦成功而造成的。这种类型的大家族在宋代文化中具有代表意义。他们构成了宋代文化、政治的主体力量。这些家族在社会上也享有崇高的声望。他们彼此之间形成世交、世婚的关系,对于政治文化的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明清列举了一系列这样的大家族,比如真定韩氏、相韩(安阳韩氏)、东莱吕氏、河内向氏、两浙钱氏、澶州晁氏、三槐王氏、春明宋氏、两曾氏、三苏氏等等皆是蝉联珪组、世代显宦,为当代的著名大家族^③。徐度列举了一系列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家族:

① 张载:《张载集》,页376,中华书局,1978。

② 参考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下篇《宋代几项重要的宗族类型的分析》,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③ 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之二,页1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父子秉政,国初至靖康元年凡十二家。兄弟秉政,国初至政和凡七家。祖孙秉政,国初至绍兴凡四家。叔侄秉政,国初至大观凡三家。^①

但宋代的基本国策是抑制强宗豪族的,范祖禹说:“祖宗以来,无强族根据朝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〇)和唐代的崔氏一门出二十七位宰相相比,宋代的世家在规模上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世家大族为了保持家族地位,往往十分重视对于子弟的教育,形成家族独具特色的家学与门风。即使是一些武功家族也通过家风的整饬将自己提升为被社会认可的“名族”。家族雍睦是重要的一项家风。比如李昉家族,宋真宗曾称赞李宗谔说:“闻卿至孝,宗族颇多,长幼雍睦。朕嗣守二圣基业,亦如卿之保守门户也。”又说:“国朝将相家能以声名自立,不坠门阀,唯昉与曹彬家尔。”(《宋史》卷二六五《李宗谔传》)保持家族的俭素作风,也是重要的一项。如朱弁记载说:“范氏自文正公贵,以清苦俭约著于世,子孙皆守其家法也。忠宣(范纯仁)正拜后,尝留晁美叔同匕箸。美叔退谓人曰:‘丞相变家风矣。’问之,对曰:‘盐豉棋子,而上有肉两簇,岂非变家风乎!’人莫不大笑。”^②世家大族数世相承,往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族学术传统。《宋元学案》中记载有不少学术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家族,比如东莱吕氏,一家登《学案》者有十七人,被称为“中原文献之家”。这些家族对于文化的传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宋代的地方望族数量更大,他们对于中央的依附程度较小,

① 徐度:《却扫编》卷上。参考李焘:《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九《国朝父子祖孙兄弟宰执数》,页176,中华书局,2000;劳格:《读书杂识》卷九、卷十《宋人世系考》,丛书集成新编本。

② 朱弁:《曲洧旧闻》卷三,页121,中华书局,2002。